

保护环境的“砝码”，怎么加都不过分

本报评论员 林 琳

2月6日出版的《半月谈》披露了中西部一些地区和企业环保数据造假的七大“障眼法”，比如，实行“阴阳台账”，一本是监测原始数据台账、一本是虚假数据台账；为应付检查，提前截断污水，增设管道把合格水注入检验水箱，使数据达标；为监测仪器“戴口罩”；把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搬离重污染区域等。报道同时显示，一些执法者成了违法者，“亲自”上阵编造、篡改监测数据。

不得不“佩服”一些地方和企业为造假使出的浑身解数——这份心力和智慧若用在正经事儿上多好！但愿此番“障眼法”的公布别成为违法企业的教材，而能成为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打击违法行为的指南和索引。

在监测设备上做手脚，进而“粉饰”监测数据，企业就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生产、赚钱，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也可以掩耳盗铃般坐收渔利——方面是企业贡献的GDP，

另一方面是数据“漂亮”、环保“达标”所彰显出的治理有方。可如此一来，遭殃的是百姓——喝的水被污染了，地没得种了，每天呼吸着有毒空气……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时，人们知道了“易粪相食”的可怕，大意就是你不吃自家种的庄稼，我不喝自家产的牛奶，他们不吃自家卖的馒头，然后都卖给别人。环保也是一样，我们大家生存在同一片蓝天之下，谁也不能逃到“世外桃源”。

一些地方和企业携手造假，说白了，就是在算眼前的经济账。造假的成本与守法的成本相比还是太低了。造假，要么临时抱佛脚，要么花点小钱就蒙混过关，而依法排污显然很“费钱”，添置设备要花钱，设备运转过程即废水废气要达标也要花钱。

如果把环保比作天平，一边是企业的各种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一边是打击、震慑这

些行为的法律、措施、执法、监管。只有不断增加惩治的“砝码”，增加执法检查的频次、广度、深度和力度，提高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增大企业的违法代价，挖出地方执法队伍、政府部门的“内鬼”，严肃追责，天平才有可能向捍卫环境、保证公众生存与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边倾斜。

同样是在2月6日，环保部公开了其与公安部、最高检共同制定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对三部门在依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时如何进行案件移送、如何配合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意味着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环境违法案件或将常态化。而这种衔接配合、齐抓共管的制度和办法，或将遏制以往的“踢皮球”等现象，其执法、司法效率和效果值得期待。对环保事业而言，这无疑是在添加了一个新的“砝码”。

从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对

违法排污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实行按日计罚，到2016年空气治理相关指标被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持续发力，再到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要求将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罪”论处，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网在一步步织密，“砝码”在一个个添加。

动辄侵凌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环保任务之艰巨、形势之严峻。环境是大家的，我们不能放任环境保护陷入“公地悲剧”。对症下药，惩治违法、保护环境，有些砝码怎么加都不为过！



扫描二维码
 关注“钟鼓楼”，看
 工人日报“钟鼓楼”评论。

老师去生二孩了，学生怎么办？

燕 农

在不能突破编制限制的前提下，学校或许只能想出收钱聘请代课教师、实行教师有序生育和排队生育等歪点子。所以，要想临时补充师资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师资，需要将教师由“学校人”变为“教育系统人”。

日前，有微博爆料称，河南驻马店第二高级中学一名班主任怀了二胎，要求学生家长替她值班，不值班的家长每人交600元钱，用于聘请校外代课教师。事后该校有关负责人回应称，经调查，此事是家长委员会私下商议做出的决定，学校和班主任并不知情，目前已退还对家长的收费。（见2月7日《新京报》）

这是则经历反转的新闻，事件仍须进一步调查，因为事关学校教学质量的保证以及是否存在乱收费的问题。无论结果如何，都避开事件背后的真问题：二孩时代的中小学校“教师荒”已经悄然而至。

据涉事班学生讲，不管是交钱还是值班，很多家长都不情愿，却也没有办法。而在校方看来，骨干教师怀孕，师资出现缺口，不是迫不得已，校方不会触碰相关教育规定的红线，或接受家长委员会私下商议的交费而另聘他人。女教师生育二孩，理当得到社会的支持与尊重，但由此导致的阶段性“教师荒”问题，却令人头疼。

去年，广州、济南、厦门等多个城市先后爆出中小学教师资紧缺的新闻。以广州为例，该市小学教师近5万人，其中女教师有3.8万多人，40岁以下的女教师有2.4万人，其中约有60%的人准备或正在生二孩。在现行的中小学校教师编制管理模式下，有多少女教师生育二孩，就意味着中小学校教师缺编多少。

对于这种矛盾，在不能突破编制限制的前提下，学校或许只能想出收钱聘请代课教师、实行教师有序生育和排队生育等歪点子。所以，要想临时补充师资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调配师资，需要将教师由“学校人”变为“教育系统人”。譬如广州的探索是：在市里和各区分别建立后备教师库，供有需求的学校遴选，后备教师来自身体健康的退休教师、拥有教师资格证的社会人员、师范院校待就业的毕业生等。同时，探索建立师范生实习支教新机制，并推行合同聘任教师制度，以应对二孩时代的“教师荒”难题。

一边是生育女之人之常情，一边是中小学教育的有序开展——这是二孩时代中小学校的两难问题。保持师资队伍的稳定，关乎着基础教育的质量大计。毕竟，师生之间，以及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互信、默契和配合，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而缓解二孩时代的中小学校教育“教师荒”，则需要一定区域内的统筹性制度安排。



调整新能源车补贴传递出的信号

唐 伟

一个人若长期在温室中，注定难以成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同样如此。政策补贴只能起到引导性作用，却不能长期坚持，否则就可能形成新的依赖。

据央广报道，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近日发布“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通知中说，新能源汽车补贴额度比2016年降低20%，地方财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单车补贴额的50%，到2020年补贴将完全取消。

国内新能源汽车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国家财政补贴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2014年仅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就超过70亿元，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补贴规模可能达100亿元。作为新兴和环保产业，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初期给予大量财政补贴，确实有行业培育、扶持的作用，不过如果仅将其产业优势或发展动力寄托在补贴层面，那么整个行业很难实现真正的进步。

一个行业的发展，最终还得脱离“供血”而靠自身“造血”，新能源汽车产业终归得以质量和创新为落脚点，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在于补贴过少而恰是过度。一方面由此造成了整个行业

将利润全部依托于补贴，而未能居安思危去降低产品成本；另一方面，补贴的实质其实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少数人，由此引发是否公平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高补贴政策滋生了大量的套取和骗补行为，比如使用低标准电池，虚报续航里程等初级骗补手段外，部分电动车厂和租赁运营公司还以循环使用电池组装配整车的方式，以少充多，骗取政府的大量补贴。在数量井喷式增长后，整个行业的质量却未有显著提高，核心技术依然未得到突破。靠补贴生存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构建了一种虚假的繁荣，2015年8月，鉴于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骗补问题，19位院士向国务院上书，痛陈长期高额补贴不利于有效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

是时候对时下这种高额的补贴政策进行调整了。一个人若长期在温室中，注定难以成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同样如此。政策补贴只能起到引导性作用，却不能长期坚持，否则就可能形成新的依赖。包括打车软件在内的互联网产品的推销，也是通过补贴，培养公众的消费习惯后，就让其进入市场竞争状态。新能源汽车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借鉴光伏产业的经验与教训，否则补贴政策一调整，或陷入倾轧争议中，或可为整个行业带来灾难。



恩将仇报

据《福州晚报》报道，近日，在福建福州，一名医生被曾救治过的患者持斧头打伤头部，在众人帮助下才脱身。据悉，肇事者因觉得治疗效果不佳，并认为医生没有收红包而态度不好才实施报复。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这年头医生真不好当，收红包当然不对，不收红包还被说“态度不好”。不少伤医事件有个共同点，即医患双方对治疗效果的预期和认同存在分歧。比如，患者觉得医生就该把肿瘤根除，而医生则认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只能做到某种程度。一面是求生的期待，一面是科学的冷冰，沟通稍有不畅，情绪起伏就可能酿成悲剧。缓和医患矛盾不简单，提升全社会对医学的理性认识水需要长期努力。

机器报警？

据《辽沈晚报》报道，不久前，辽宁凤城的吕女士在ATM机取款时，遭遇一蒙面男子抢劫，ATM机突然传来监控中心的警告声；“立即停止抢劫，我们已报警。”男子抢得700元后仓皇出逃，日前这名男子已被抓。

此番事件中，正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发布警告，才让抢劫者仓皇出逃。工作人员监控时点之精准、止损效率之高令人赞叹，同时也震醒了更多不法分子。现实中，虽说吕女士们不会总是如此“幸运”，但银行方面多打一些提前量，对储户可能面临的风险多些准备、多上点心，是能够做到的，不求24小时派人盯着监控，但至少应装了摄像头却压根不开，或损坏多时却无人问津。

“白天不懂夜的黑”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于涛

“检查配电柜”“插接电力连接器”“进行起机排水试验”……寒冷的冬夜，沈铁长春车辆段检修现场，对讲机的呼叫声此起彼伏。

“全车检修必须在8小时内完成，明天一早，这组列车将再次远行。”长春至拉萨列车专修组组长李斌，带领工友们正忙得热火朝天。

长春进藏列车是东北地区单次走行里程

与时间最长的列车。加之配置了很多高原专用设备，长春进藏列车每一次入库检修，都是一场高强度“战役”。

“我们小组共8人，负责检修车辆上所有电气设备，进藏列车入库时间一般在晚上9时左右，所以夜里是我们一天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检查完配电柜，李斌转身打开了制氧控制柜。

制氧设备，为进藏列车所独有。列车入格尔木至拉萨路段，由于海拔升高，制氧设备必须全部打开，氧气通过空调装置弥散式传送到车厢，同时，车厢内也设有应

急供氧口，可供高原反应强烈的乘客单独使用。

“制氧设备原理复杂，今年它还是头一次在高寒的东北过冬，我们检查发现季节性出问题非常突出，比如冷凝水易导致供氧管路结冰堵塞。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研究了一整套解决措施，每次进行起机排水试验，观察风缸有无残留冷凝水，保证管路伴热系统好用……”忙完这一系列操作，李斌逐一打开车厢的应急供氧口，只听里面发出阵阵“嘶嘶”声，这意味着有氧气传来，设备无虞。

（上接第1版）

截至目前，该局的项目部100%建立了工会，使用的7.98万名农民工全部加入工会，其中6.9万人是从项目上入会的，该局的做法被陕西省总工会推广到了全省。

委托工会：劳务派遣工的入会源头

在陕西省体育场椭圆形建筑西侧的三楼，有一间约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这是上海外服（陕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人事基层调解委员会。屋子虽小，调解员也就3名，却是该公司派遣到各行各业的7万多名劳务工维护权益的一道关键防线。

“有好几个争议案等着调解呢，一般尽量调解成功，否则进入仲裁，时间长、成本高。”调解委副主任龚霞说。

记者翻看了一宗2014年10月立案、2015年4月结案的劳动争议仲裁卷宗档案，厚厚的一叠。

田先生曾是该公司派遣到一家单位的管道工，工作中不慎扭伤腰骨，单位及时送医院治疗，但未向工伤保险机构报备。在申请鉴定为工伤十级后，2015年4月，田先生与用工单位在工伤待遇上发生争议，提起劳动仲裁。

“这是我们派遣过去的员工，劳动关系在我们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会会员，我们得介

“如果不创新，怎么可能全覆盖？”

人调解。”上海外服陕西公司工会副主席张玺说。调解并非易事，从调查核实事实，到听取各方意见，把握权益、权衡利弊，经过半年多日的往来交涉，双方终于签署和解协议，用工单位赔付7万余元。

2013年调解委挂牌至今，累计参与处理用工单位劳动争议协商调解3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75%以上。

上海外服陕西公司有派遣员工34541人，代理人员35323人。2012年8月，经陕西省总工会批复，该公司有了工会。劳务派遣工的会籍问题由此提上桌面。“公司工会把劳务派遣工全部纳入，然后再委托用工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与服务，这样就把关系理顺了。”该公司工会主席王亮解释，“一方面谁的员工就在谁那入会，另一方面到哪里干活就在哪里开展活动。”

2012年，上海外服陕西公司率先与中行陕西省分行签订了劳务派遣工《工会委托管理协议》，委托该行负责派遣员工工会经费的使用及工会活动的组织。之后，中国移动、中国石化、西铁局、北方光电等陆续签订委托协议。到目前，该公司劳务派遣工全部加入工会，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保参加率均达100%，

70%还享有住房公积金。

医药行业工会：覆盖360家小店

汉中西乡县，县城东有个派林大药房连锁店，店长黄晓云名气不小。2015年，她代表公司参加医药行业工会最强店长的选拔赛，夺得西北片区总冠军、全国亚军。“我的专业知识、技能都是到这打工后开始学的，公司每周有员工培训，每月有店长培训，每年有拓展训练，2014年我通过竞争当上店长。”她说。

黄晓云的成长故事，是汉中市汉台区民营医药行业工会搭建平台帮助农民工成长的一个缩影。“我们制定了鼓励学习的奖励、报销、提拔制度，公司工会组织实施，把每位员工都培养成为会收银、会中药调配、会OTC对症推荐、会处方组联推荐等的六会全能人才。”汉中派林大药房总经理王忠慧说，她也是通过学习从普通店员成长起来的。

汉台区有许多药店、诊所、小医院，民营性质、服务业、小而分散是最显著的特点。区总工会主席李汉元是个“老工会”，琢磨着怎样把它们组织到一个工会中来。

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2011年，汉台区区总把30个民营医药企业组织到一起，成立了民营医药行业工会联合会，涵盖医院、诊所、药店227家，覆盖员工1500余人。

“工会成立后，我们先在各个企业中建职工之家，然后就是开展活动，特别是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竞赛提素质，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李汉元说。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每年的必选动作。从第二轮协商开始，行业工会将拥有较高专业职称人员的工资基数设为行业上线，将营业员、护士、初级职称人员工资基数列为中线，把一般性劳动人员工资基数列为最低工资，使各方利益得到兼顾。

到目前，汉台区民营医药行业工会联合会已扩大到涵盖药店、诊所、医院360家，发展工会会员2300余人，其中农民工会员1287人。

目前，陕西省总工会正将各种建会的创新经验推向全省。到2017年底，陕西将完成“奋战三年新增农民工入会100万人”的目标。

白阿莹说：“我们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群体制宜创新建会，不拘泥于已有的形式，一切服从于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的需要。在建会程序和职工入会手续上，要适应各类企业的特点，力求简便、灵活、易行、高效。”

（上接第1版）

——对党员干部，各地普遍用党纪进行规范，严重者会被免去职务、开除党籍；但对普通群众，在违规“整酒”的处罚措施上各不相同，有的要求公安、食药监等部门进行查处，有的处罚饭店老板，有的甚至取消低保资格。

“治酒令”出台后，在一些地方已初显成效。姚溪是巫溪县上磺镇的一名个体户，她有个专门的账本记录份子钱。在这个账本上记者看到，两年前她平均每年交份子钱4万多元，自从整治无事酒后，年均仅3000元左右。

与此同时，记者调查发现，“治酒令”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效果差异较大。在只规范党员干部整酒的地方，党员干部管住了，但普通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盛行。石门县的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2013年该县明确规定除婚嫁丧葬外，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国企员工一律不准整酒，在严禁禁止下，石门县公职人员整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民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整酒风依然如故。

有些地方虽然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起管，但因为对后者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秦巴山区一贫困县整酒办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整酒措施对普通群众的效果不好，因为没有太多办法。”

治酒须掌握界限 应注重订立村规民约移风易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酒过程中，有些地方
 的整治措施也引起争议。比如，有的地方

规定，复婚不准操办酒席、群众操办婚嫁酒须填写申报表等。

“大操大办的铺张宴请风的确已成为群众不小的负担，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遏制‘歪风’，但规范不宜‘越界’，不能超过法律法规的授权限制群众置办酒席的正当权利，模糊‘公私’界限。”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授李萍说，各地最好通过发动乡贤，订立村规民约、激活乡村自治机制来引导民间移风易俗。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刹住“整酒风”，不少地方已经在探索利用村规民约进行引导。湖南省宁乡县大成桥镇大成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分别制定章程，在倡导从新从简办理红白喜事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比如，“村民办红白喜事，理事会送窗花剪纸、对联、自制花盆等”“村民办白喜事统一送慰问金200元、送挽联、花圈、鞭炮等，村干部不另送礼”。

巫溪县在整治“无事酒”的过程中，村规民约也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我们整治的经验，村规民约很好地填补了制度的漏洞。但要让村规民约落到实处，还需要从党员干部抓起。”巫溪县纪委书记张记民说，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引导民风好转；另一方面还要对其严格责任追究，以防“无事酒”整治措施落实不到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倪洪涛建议，刹住“整酒风”应走出处罚依赖症，政府可以用行政奖励等柔性方式进行引导，对不大操大办的实施奖励。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一份坚守换取千家团圆

本报通讯员 袁宝
 本报记者 黄康

在从牡丹江开往大连的T262次列车上有两位特殊的工作人员，他们是T262次4组的明星“夫妻档”，丈夫叫孟祥龙，妻子叫哈长华。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个年头。

夫妻俩结缘在客运岗位，那时孟祥龙在北京5组，哈长华在北京2组，同样担当8号车厢乘务工作。这两个班组是交接班关系，一来二往，他们擦出了爱的火花。从谈恋爱到结婚的两年中，他俩见面约会的地点90%以上都是在车库内的火车上，被同事称为“交接夫妻”。

说起家庭，一直让夫妻俩遗憾的就是从